

江亢虎講演錄

853.1
DP39

記遊俄新虎亢江

編輯兼發行者

上海戈登路宜昌路

上海牯嶺路餘慶里

商務印書館暨各大書坊

江亢虎博士演講錄（第二集）

自序

寰遊十載。感想萬端。返國以來。隨緣演說。既無夙構。亦不起草。聽衆筆記。率付報章。展轉傳訛。末可究詰。惟江西山西兩省教育會所印。及南京東南大學諸生所述。猶具梗概。亦或脫略節目。羼入方言。其餘多無可觀。尤不足存。南方大學汪劍餘君。乃積六閱月之辛勤。蒐輯成帙。獨任繕寫校讐之役。再四慾惠上版流行。余重違其意。勉爲披閱。正其闕謬。釐爲兩集。凡三十餘萬言。就中社會問題。初講在東南大學。聽衆不下千人。筆記不下百通。已印行者。亦十數通。此取張孟聞君原稿。比較特詳。第二講在北京男女高等師範兩校。第三講在南方大學。雖大同而皆小異。

焉。其有口說而無筆記。或有筆記而蒐輯未及者。蓋數倍於此。夫一時感想。本不能爲意志之代表。况口說不能盡傳。感想筆記不能曲肖口說。讀者執是以求。其知我亦已。僅矣。行年四十。猶是坐言之人。徒以空文自見。此錄之出。又豈余意哉。

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江亢虎

目錄

江亢虎博士造像

自序

第一集

教育者之責任	一
求學與救國	五
蒙鐵梭利教育法	九
社會改造說	二十一
中國文化在西洋之影響	二十二
西洋文化在中國之影響	二十六
在江西第一師範學校講演詞	三十
在江西女子師範學校講演詞	三十一

在江西女子職業學校講演詞	三一三西
在江西心遠中學講演詞	三一三五
在江西第一中學講演詞	三一三七
在江西義務女學講演詞	三一三七
在江西匡廬中學講演詞	三一三七
在江西第二中學講演詞	三一三七
在江西甲種工業學校講演詞	四一四三
在江西國語講習所講演詞	四一四三
在江西農業專門學校講演詞	三一四四
在江西法政專門學校講演詞	四一四五
在江西農商公讐席上講演詞	五一四六
宗教進化	五一四九

社會主義之今昔

四九——八三

女子在社會上之地位

四一——九七

中國文化及於西方之影響

二三——一〇四

西方文化及於中國之影響

二一——一〇四

教育之新趨勢

二二——一〇四

國民大會

二三——一五

代議制之改良

二五——一四

在北京懷幼學校演說詞

二四——一三

在北京大學愛智學會演說詞

二三——一六

在山西太原自省堂演說詞

二二——一九

戰後俄德二國之現狀

一九——二〇

無業問題

一六——一七

代議制之研究 一六一一七三

歐戰與中國文化 一七三一一七七

游俄雜談 一七七一一八四

社會主義的進化 一八四一一八八

第二集

社會問題

資產問題一 資產之界說與其種類
生利 資產之進化

資產之起源

資產自身不能

一十一
九

資產問題二 資本主義之功罪

一十六
六

資產問題三 資產所有權之移轉 公有之性質及其區別

一十七
七

資產問題四 資產公有之入手 資產公有之利益
社會政策之不同 社會資本主義名詞之規定

一七
三七

資產問題五 資產問題釋疑

一七
三七

勞動問題一 勞動之界說與其種類

四五
一三

勞動問題二 勞動爲富源三分之一說 勞動萬有說

五一 五九

勞動問題三 資本主義下勞動者之苦況 各國勞動運動

五一 七

勞動問題四 調和勞資之學說與其方法 工價廢止與勞動報酬

五一 九

女權問題一 原始時代之女權 女權凌替之原因與其經過

五一 八七

女權問題二 中國古哲學之女權觀 中國及各國女界之苦況

八七 九七

女權問題三 男女關係問題 男女一致與男女平等

九七 一〇六

女權問題四 女子天然之缺陷 妨殘女權與崇拜女性之兩極端

一〇六 一一六

家庭問題一 家庭之界說與其種類 家庭之起源 宗法社會之文

二六 一二四

家庭問題二 大家庭制度及其條件 小家庭制度及其條件

二四 一一三

家庭問題三 題 家庭問題平論 無家庭主義及其條件 限制生產問題 兒童公育問

二三 一一四

江亢虎博士講演錄第一集

教育者之責任

(在江西教育會講演
民國九年十月一日)

吳大樽記

鄙人此次返省，祇能勾留五天；且離鄉太久，社會狀況，非常隔閡。今蒙諸位同鄉，歡迎講演，好像一部二十四史，真不知從何處說起。鄙人講演，向係由各地自定講題，今日的講題「教育者之責任」，原是省教育會定的，範圍仍是很寬，不能一一陳述。但就我一時想起來的，說一說罷了。回想鄙人在前清時代曾做過腐敗的官吏，那知到了民國，官吏更腐敗了；所以至今未嘗一登政治舞臺。惟自讀書識字以來，關於教育事業，最愛仔細研究，可惜余生也早，并不是從學堂裏一條鞭畢業出來的。雖曾充任北京大學教員多年，當時風氣初開，故得濫竽充數。若在今日，豈不慚愧！自民二社會黨解散以後，個人也有生命的危險，遂亡命往美國；又為生計而就職業，不能專心求學，實係一大憾事。我想中國官吏腐敗之故，也是因為多數人沒有獨立生活，禍國害民，實基於此。鄙人在美忝主講席六七年，與在本國辦學合算，共有十三年，都是處於教育者之地位。現在就我的經過，我的心得，對於這個講題說來，以為教育者之責任，可約分為四種：

(一) 教育者對於學說或學術上的責任。教育者對於各種學說，應取研究的態度，只要說明，不必判斷，因

教育與宗教不同。教育者不是傳教師，傳教師是傳播他的宗教，自爲主體；教育者是傳播別人的學說或學術，應該自爲客體，不可參以己見，妄加武斷的批評。因爲青年血氣未定，一切先入爲主，往往阻其思想的進步，所以講什麼學說，便當忠於什麼學說，否則成見在胸，強題就我，那就失却了教育者的本來面目；因世界文化日進無已，學說是非隨時而殊，古時所謂公理，現在多已根本動搖，去扶持那已經動搖了的舊道德，固屬不必而一味好新好奇，盲從現在的新道德，也是不對的。教育者只可處於旁觀的地位，敷陳成說，引起新知，聽學生自由思審，自由抉擇。比方鄙人在美国大學擔任的學科，是中國文化。我在講堂時，便將素抱的社會主義，拋在一邊，專去宣傳中國文化。講孔孟時，就闡發孔孟的宗旨；講楊墨時，就闡發楊墨的宗旨，倘若加以己見，牽涉傳會，就不免有畫蛇添足之誚了！

(二) 教育者對於學校的責任。教育者對自己的職務，應認爲一種天職，並且當做是終身的事業；對於學校，應認爲服務場，好像軍人對於國旗，消防隊對於救火警號，船員船主對於所駕駛的輪船，應該存一個守死勿去的責任心。我國嘗說師嚴而後道尊，現在中國的教師，是太不自尊重了，或倚教育爲噉飯之地，或藉教育爲進身之階，這種人那能得人尊重他。我們既然許身教育，就不應見異思遷，必須忠於所學，忠於所職，這就是美國大教育家羅爾斯 Royce 氏的忠學。這個是抽象的忠，理想的忠，與忠於個人，忠於一姓的不同，一切奮鬥精神，犧牲精神，都從這裏發生出來。

(三) 教育者對於學生的責任。我們須知教育者對於學生，不能增益其所不能，只要啓發其固有的可能，就算盡了責任。如我中國舊式教育的食古不化，貪多嚼不爛，那是大錯的。凡造成一個完全的人，却有三種關係：(甲) 遺傳。從祖宗父母承襲來的，所謂先天的秉賦，這個關係做人的三分之一。(乙) 環境。由社會種種機會湊合而成的，有時候不是人力可以勉強得來，這個又關係做人的三分之一。(丙) 教育。這也不過三分之一的體力而已，教育萬能這句話，未免太言大而夸了。我們想為學生增益其所不能，是萬做不到，惟有利用他的可能性，使好的可能性，有自然發展的機會就是了。所以學校對於學生，因材施教，隨時指導，是唯一的方法；不可過存奢望，也不可因希望難達，就去灰心。近代教育的趨勢，是要發展學生的個性，如德國日本整齊劃一帝國式的機械教育，是太陳舊不適用了。我們對於優等劣等兒童，須加以特別之待遇，所以有許多新式學校，採用單獨教授。美國公學，雖然也取畫一制而私立學校中，往往兩三學生，竟開一班，他們的成績，常比公立的好些。近有一個資本家，辦了一個學校，學生僅五十幾個，他的年齡自十二歲至十七歲，均是看他的個性，施以適宜的教育，表面上雖似貴族制度，實際上却是自動精神。就是講社會主義的人，對於教育也是取啓發個性的，所謂教育平等，乃是增進普通程度，並非壓迫優秀青年。我國舊式的家庭教育，和私塾的各別教授，很像也是啓發個性，惜乎用意不同，對優等生是用填鴨主義，對劣等生是用高壓手段，不能記憶，即加夏楚，這樣與西洋畫一式的教育，同有抹殺個性的危險，都是消極的，不是積極的。我們對於劣等生，不可不知三種救濟方法：(子) 教育救濟，(丑) 醫理救

濟。(寅)法律救濟。法律救濟，不定是加以刑罰，西哲說：『天下無罪人，只有愚人。』因罪惡都是由教育或環境或遺傳的不良纔發生的，刑法的沿革，最初採報復主義；如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就是採這個主義；後來採隔離主義，他的意思，以為罪大惡極，不可救藥，把他監禁起來，以免貽害社會；到了現在，是採感化主義了，所以監獄裏有感化院，差不多像一種公立學校似的，這個可與教育相輔而行。

(四)教育者對於社會的責任。教育者對於社會，負有表率的責任。教育者固然應為學生的表率，但學校為一地方文明中心，所以教育者同時要為社會的表率。羣性的勢力，固然很大，有時個性的勢力，也能够轉移羣性。做表率的人，應以良心為道德標準。因道德有變遷，早先認為道德的，今日有認為不道德的，惟良心為臨時之標準，比較的靠得住。凡自命為社會表率的人，事事要憑着良心做去，毀譽得失，都可以不必管他。並不是要世界對我都無異議，才算表率，總要所倡導的學說，確本於良心之自由就是了。

以上四種，也不是什麼科學分類，不過為臨時演說的便宜。我從前發出公函，有「發揮舊文化，輸入新文化」之說，我並不是無意識的迷信舊文化，也不肯無意識的崇拜新文化；然以為舊文化不但要保存，並且要用世界眼光，科學方法，去發揮他；至於新文化現在最要輸入，暫且不必批評，因為輸入很少，縱是批評也沒有價值。我是主張社會主義的，所謂新文化，雖與社會主義很有關係，但不是同一樣的東西，所以我並不願用新文化這個名詞。今天我所講的，可概為兩句話：凡教育家一面要養成學生的自動力；一面要提起自己的責任心，但有責任心的

人，又要結合一個團體；不然，就沒有實力，就不能滿足我們的責任心與這個惡濁社會宣戰了。

求學與救國

(在江西教育會講演)

韓志賢記

今天到會的人，多數是學生，所以就講這「求學與救國」的題目。我在美國已七八年，本國新文化運動的狀態，未嘗親見，不過就報紙所載的，知其一二，說來不免有隔靴搔癢的地方，還要請大家原諒；

我看一般國人，對於學生救國運動的意見，不外兩派：一派是反對以罷課為救國方法的。他說學生當求學時代，應當研究學問，造成完全高尚的國民，以為將來救國的地步。若在求學時代，借口救國，拋棄光陰，恐怕是國還沒有救，自己的光陰和學業已受了莫大的損失。到了將來實行出來替國家做事的時候，反沒有真實的學問，那時候悔也遲了。這派人的議論，也有道理，我不敢說他的不是。一派是贊成以罷課為救國方法的。他說學生求學，原是求救國的學問，現在國事日非，我們學生不從事救國運動，倘若國已亡了，即有高深學術，亦無處可用了，所以不惜犧牲一切，拋棄暫時的功課，挽救永久的國家；這派議論，頗受社會的歡迎。

我以為這兩派議論，各有理由，所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豈可加以武斷的批評呢？但是凡事有經有權，有緩有急，曉得經權緩急的分別，自然不會做錯了。哲學家說：『是非真假優劣，都是相對的，比較的，并非絕對的。』農人不能因救國而輟耕，工人不能因救國而罷工，商人不能因救國而罷市，因為農工商各有職業，捨職

業而爲救國運動，是不明白輕重緩急的道理。農工商三界如此，學界也是如此，因爲求學就是學生的職業，盡力自己的職業，爲一問題；服務社會公益，又一問題，不能因從事職業，而忘却社會；也不能因奔走公益，而拋荒職業。學生以求學爲救國，效果雖緩，却是經；以罷課爲救國，效果雖急，却是權，經可永久用的，權只可暫時用的，經是救本的，權却是救標的，諸君明白這層道理，就得了求學與救國的精義了！

還有一層人嘗把求學與救國分爲兩截，劃分出兩個時期出來，以爲學生未畢業前，是求學時期，不必救國；畢業後是救國時期，不必求學，所以我國學生，往往以得了畢業證書，爲求學終止時代，這種謬想，是很危險的！學問本無止境，畢業兩字，不過表明在某校修業期滿，并非說我們的學問已經告終，若認真講起來，不但幾十年不能畢業，就是今天把現在的學問都學畢了，到了明天又有新學術發明出求，那裏有畢業期限呢？所以一方面說求學時代，就是根本的救國；一方面說畢業出來，爲國家做事，還是實驗的求學，兩件事本是一件事，我國那種兩截的謬想，都是歷史上遺傳下來的，因爲自有科舉以來，古代學校，變成了教育的輔助機關，主要還在考試；後來仿照著外國人辦新學堂，也就把那科舉的思想比附他，什麼小學畢業獎秀才，中學畢業獎五貢，大學畢業獎舉人進士，外國畢業回來的，還要獎翰林（俗語叫做洋翰林）這種思想，根本錯誤，煞是好笑。現在學校獎勵辦法，雖然停止，然而大學還有學士、碩士、博士各種頭銜，一般人仍拿科舉時代的眼光看他，這種妄見不割掉，教育的真精神，何能實現呢？大家要知到，自小學到大學，是學校內求學的時代，有教師指導，好比兒童要學行路時

時要大人扶持，到了大學畢業的日子，才算脫離學校內求學的第一日，即為學校外求學的第一日。到這時候方才算得有自己求學的能力，好比兒童自己會行路，不要大人扶持的樣子，所以英文名詞畢業，實在是始業的意思，就是這個道理。可惜被中國翻譯錯了，誤盡青年。我看中國留學生由外洋畢業回國，就自以爲滿腹經綸，登峯造極，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樣子；於是把學問完全丟開，專工去求升官，想發財，對於新學術，新思潮，那裏再有工夫研究？中國學術界不進步，這實是一個大原因。所以我想辦一個大大的圖書館，不但是爲社會教育學校教育的補助機關，也是因爲一般畢業留學生可以增進新知，更求深詣，隨時進去看最近出版的新書新報，庶幾乎不至於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可見圖書館實是大學以上一個研究院呢！

去年「五四」運動，全國學生聯合會的成績甚好，德約拒簽字啊！保留山東問題啊！曹章陸免職啊！霎時間罷學，罷工，罷市，全國震動，社會上都以學生爲救國的主要分子。那曉得罷課又罷課，弄得司空見慣，習以爲常。起初農工商各界還肯做學生的後援，各省長官也有打電響應的，中央政府鑒於衆怒難犯，居然事事俯就輿情；第二次罷課，那農工商就不罷工罷市了；到第三次罷課，官廳且有實行干涉的，這是什麼道理呢？就是學生以權二步，第三步，以至最後一步。譬如引火，第一步用火柴發火，火已着了；但是這區區燐寸，霎時即滅，不預備第二步的燃料，究有何用！去年學生以罷課爲救國的方法，畢竟沒得好完全效果，就是只有第一步的辦法，沒預備第二

第三步的好像祇有一枝火柴，沒有別的燃料接濟他。諸君試想：如果罷課就可救國，那救國的事業也就太容易了，一罷課就救得了國，世界上只要有學生，只要會罷課，那裏還有亡國之慘呢？所以我常說罷課是消極的，求學是積極的，積極的是經，消極的是權，經可常用，權是不可常用的；常用就越用越不靈了。

「五四」運動，不是要求誅戮曹章陸嗎？大家曉得曹章陸從前是日本留學生，我在日本正與他們同時；時候中國留日學生，一共只有三十九人，平日談論祖國的事，他三人痛恨政府腐敗，外交懦弱，要想如何整理內政，如何恢復主權，一種愛國的志氣，救國的熱心，也不讓現在「五四」運動的學生。不料一做了官，就漸漸變了！宗旨，前後迥若兩人，這是什麼原因呢？我說：這是地位的關係，當日留學的時代，立於學生的地位，環境乾淨，空氣新鮮，所以就講救國；後來從政的時代，立於官僚的地位，種種引誘，種種牽掣，身家的觀念太重，周圍的關係太深，所以竟不惜賣國求榮，甘心做一箇國賊。但是仔細想想，他們起初何嘗不想做箇好人呢？無奈受了環境的影響，不知不覺就爲社會所軟化了。古人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又說：『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可見我們若不能有特立獨行的精神，執銳披堅的力氣，去戰勝環境，就會被環境戰勝了！地位問題，影響極大，比方外國資本家，是社會黨和勞動家所深惡痛絕的，往往有由勞動家出身變爲資本家，到這時候，他虐待勞動家，反比從前資本家虐待他的時候更厲害，好像忘記自己從前的苦處，這也是地位的關係，立於勞動家地位，就與勞動家同情，立於資本家地位，就與資本家同鼻孔。還有一個最淺近的比例，我們江西人不是歡喜蓄童養媳麼？做婆婆的不是大都